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研究

■ 王彩璐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对于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逻辑和价值

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当前，国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国内层面，各区域科技实力与产业布局不均衡，城乡发展差距、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实际。这一基本国情从根本上

上决定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牢牢坚持“因地制宜”的总方针，不能脱离地区实际搞“一刀切”。

因地制宜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行之策。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探索适配本地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反之，若忽视地区差异、违背因地制宜原则，盲目推动各地区以相同模式、相同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轻则导致资源错配与同质化竞争加剧，重则可能在新质生产力尚未培育成型之时，过早放弃现有优势生产力，反而造成区域生产力水平的阶段性下降，最终抑制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实践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把握好“破”与“立”的辩证关系，坚持“先立后破”的推进原则——绝不能在新产业、新动能尚未建立稳固支撑前，就贸然抛弃传统产业与既有生产力，避免出现经济发展的“空窗期”。同时，新质生

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必须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先进产业和未来产业。

（一）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升级

传统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存量规模大，对于解决就业、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但存在一般产品竞争激烈、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大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尤其要支持传统产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助力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就要求传统产业主动作为，积极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一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推动生产装备与工艺流程升级，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革新管理体制与经营模式，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困境和优化路径研究

■ 李锦程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困境

（一）社区认同有待增强

村改居社区多位于城郊结合部，房价与房租相对低廉，成为流动人口的过渡性居住区域。加之原有村民、城市居民等群体，社区人口结构复杂。由于人口身份存在差异，不同群体的管理方式、享受的政策及福利待遇也有所不同。例如，村民作为村集体资产的共同持有人，享有分红、民主决策等集体相关福利待遇，这使得村民在心理上易形成“排外”倾向；而非村民群体因待遇差异及“暂住”心态，对社区缺乏归属感与认同感，进而不愿参与社区自治。

（二）管理内容复杂多样

村改居社区的组织功能、管理内容与作用发挥，均与传统农村社区存在显著差异。组织功能差异：农村社区侧重生产保障与乡村治理，管理依赖集体共识；村改居社区则在农村社区管理基础上，需聚焦居民与村民的多元生

活服务及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协作”。服务对象差异：村民委员会以户籍为依据管理村民，而村改居社区服务对象复杂，难以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内容多元：村改居社区已成为城市治理事务的核心执行单元，需承担文明创建、疫情防控等大量工作，给基层治理带来较大压力。

（三）社区治理权责失衡

村改居社区存在过度行政化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方式与治理模式。原始村庄的传统熟人社会与文化网络被割裂，多元治理主体各自为战：既有街道与社区间科层制的纵向权责划分，又有社区、社会组织、物业等主体间的横向权责划分，甚至出现相互排斥的情况，导致村改居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突出。

三、村改居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增强居民自治意识

增强居民自治意识的核心是提高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与治理能力，可从三方面推

进。一是畅通参与渠道，在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中广泛收集不同群体意见，培育各群体代表骨干，以骨干带动周边居民，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自治的积极性。二是加强文化建设：定期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居民的归属感。三是提高自治能力：通过召集坝坝会、楼栋会、居民议事厅等形式，让居民直接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二）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构建由街道、社区、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治理主体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理清政府职能范围，将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帮扶困难群体、提升公共服务等作为社区工作重点，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事务。二是培育社会组织：培育真实有效的社会组织和志愿队伍，在公共服务、文化活动、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建立社区智囊团，吸纳退休干部、有能力的老党员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营造更加和谐的社区氛围。三是提升物业与业委会能力：通过加强培训，提高物业与业

委会的治理水平，形成良性治理生态。

（三）社区去行政化

一是彻底落实基层减负：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能范围，制定“社区履职职能清单”和“依法协助行政清单”，弱化社区在城市治理事务的角色，让基层治理主体能腾出手来处理社区事务。二是转变街道角色：从“指令者”变为“赋能者”，街道不再对社区进行量化考核，聚焦社区“资源整合”和“能力建设”，建立“街道-社区”协商机制，推动多元协作。

综上所述，村改居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实践，其治理困境本质是制度转型与居民需求的适配难题：既面临集体资产归属模糊、治理主体权责交叉等历史遗留问题，又存在服务供给与居民多元需求脱节、居民身份认同及参与意识薄弱等现实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需以系统性思维推动治理优化，注重培育居民共同体意识，激发自治活力。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村改居社区从“形式转变”走向“内涵提升”，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基层治理支撑。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

一、村改居社区的概念及意义

村改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象，带有鲜明的中国国情与地方色彩，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村改居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与大力推动下形成的特殊产物，核心特点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非农化”转变。有专家指出，村改居社区实质是因拆迁安置形成的新型社区形式，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农村地区整村拆迁的直接结果。村改居社区地处城乡结合的过渡地带，兼具城乡生活方式特征，却有别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面临人口结构多元、矛盾冲突多发、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持续给社区治理带来挑战。深入研究村改居，对完善基层治理、

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策略研讨

■ 张艺凡

新时期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与数字技术快速渗透，农业经济迎来产业融合、模式创新的新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科技革命加速迭代、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国内外市场波动等新挑战，农业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进程中遭遇明显瓶颈。因此，农业经济需主动突破传统发展路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以持续促进农业经济提质增效，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贡献力量。

一、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

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尖锐。当前，农业以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土地细碎化严重制约了标准化生产、规模效益的实现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同时显著增加生产成本，导致市场竞争力减弱。多数农业生产者仅停留在生产初级环节，缺乏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未能建立成熟的农产品品牌。尽管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迅速，但部分主体尚未形成规范化运行体系，带动能力有

限；同时，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机制亟待完善，其市场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较弱。第二，农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优异种源、高端智能农机、新型肥料、生物农药、关键生物育种技术等领域均存在瓶颈，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且农业科研与实际生产需求衔接不畅，受推广方式单一、知识滞后等因素影响，许多适用农业技术未能真正落地田间。智慧农业的推广未达预期广度与深度，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仅局限于试点区域。第三，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持续收紧。部分耕地面临土壤酸化、黑土地变薄等质量风险，以及农膜残留、重金属残留等污染风险。农业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用水效率偏低，在气候变化、水资源分布不均的背景下，农业节水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亟待加强。

二、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策略

1.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新时期下，要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部门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农业现代

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首先，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优化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托管、入股等方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其次，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再者，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推动其规范化发展，提升经营质量。最后，优化农业补贴政策：重点补贴农业经营质量提升、绿色生产等领域，强化政策支持力度。

2. 进行科技创新

相关部门需集中科研力量来攻坚农业核心技术，可增加绿色投入品、智能农机装备、生物育种、耕地质量提升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需持续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培育更多的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协同高校专家、科研院所教师专家等来为基层农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需主动引导企业参加农技推广活动，搭建一个社会化、多元化的农技服务网络；需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在

农业经营中，在农村地区搭建农业大数据中心，在实际生产当中科学运用智能化装备、遥感监测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等；需不断升级农业装备，不断研发适合我国农业产品生产经营的高端农机装备，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解决丘陵山区机械设备应用难题，进而提高农产品生产率。

3.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理念是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相关部门需将其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首先，强化耕地保护：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轮作休耕、保护性耕作等绿色种植模式。其次，发展节水农业：普及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再者治理农业污染：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引导农户使用有机肥与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构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最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挖掘农业生态产品价值，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4. 拓宽产业增值空间

相关部门为有效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可有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首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支持农户开展农产品初加工的基础上，鼓励农业企业进行精深加工；培育本地龙头企业，建设规范化农产品加工园区，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其次，实施农业品牌战略：挖掘地方特色农业资源，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本土农业品牌，以品牌优势带动产业发展。最后，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乡村民宿等新业态，实现产业双赢。

总而言之，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复杂性与系统性，需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度障碍，强化科技创新提供核心动力、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保障可持续性、拓宽产业增值空间提升经济效益等综合策略，形成政策合力，才能有效解决发展难题，推动农业经济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诸城市审计局）

浅析实干型领导对乡镇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 刘甘宇

何政策宣导或道德说教都更具感染力与可信度。下属在长期观察与参与过程中，会逐渐将外在的服务要求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认同，进而增强对公共使命的情感承诺与认知理解，公共服务动机随之深化。

（二）在目标中清晰责任归属

实干型领导善于将宏观政策目标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任务。他们通过合理分工、明确节点、过程跟踪与结果反馈，帮助公职人员清晰把握自身职责及其与整体目标之间的关联。例如，在推动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时，实干型领导会将任务拆解为产业发展、环境整治、文化挖掘等模块，并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复盘。这一做法显著减轻了乡镇工作者常见的“事务繁杂却成效难显”的角色压力，增强了工作的可控性与意义感。当员工意识到自己的每项努力都在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时，其责任意识与服务意愿也随之提升。

二、心理安全感：承上启下的关键心理桥梁

实干型领导之所以能激发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营造出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氛围。心理安全感是指组织成员在表达意见、尝试新方法、承认错误时，不必担心受到负面评价或惩罚的共同信念。

（一）信任包容取代问责批判，让员工“敢作为”

实干型领导通过示范容错文化，在日常管理中构建起坚实的信任氛围。面对复杂多变的基层事务，工作人员在政策执行或群众服务中难免出现偏差甚至失误。若领导动辄批评问责，容易导致队伍趋向保守，甚至隐瞒问题。实干型领导则更注重从问题中学习，在出现工作偏差时，首先组织团队进行复盘分析，注重改进而非个人追责。在一些实际工作中，实干型领导不会简单指责驻村干部，而是带队深入村庄调研，与干部一起分析阻力来源——究竟是宣传方式不到位、技术方案不贴合实际，还是资金配套存在缺口，进而协同调整工作策略。这种“重改进、轻责罚”的管理方式，实质是给予干部合理的试错空间，帮助他们放下“怕犯

错”的心理包袱，更敢于在服务群众中尝试创新方法，如探索多样化的政策动员方式、灵活调整工作流程等。长期下来，团队会逐渐形成“聚焦解决问题而非回避问题”的氛围，干部更愿意主动担当作为，而非机械执行或推诿塞责。

（二）开放沟通激活主体意识，让建议“有回响”

实干型领导深刻认识到，一线干部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他们的实践经验与直观感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这类领导会着力搭建多样化、常态化的沟通渠道，确保基层声音能够被听见、被重视。除正式工作会议外，他们还善于利用非正式场合开展交流，如在食堂就餐、下乡调研途中与干部亲切交谈，专门听取工作人员的想法、困难与建议。更重要的是，实干型领导不仅注重“倾听”，更强调“反馈”与“落实”。例如，在制定年度环境整治计划时，领导班子会先让各驻村工作组提交初步方案，并召开专题研讨会，让每位负责人详细陈述方案的

设计思路与可行性。对于干部提出的合理建议，如根据村庄布局优化垃圾收集点设置、针对留守老人群体调整宣传时间等，领导会明确表示采纳并纳入最终计划，甚至在后续工作会议中定期通报这些建议的实施进展与成效。这种“听有所应、建有所用”的沟通机制，远胜于单纯的物质激励，能够激发公职人员更深层次、更持久的内在动力，推动他们持续投入公共服务，并主动思考如何改进工作、提升服务质量。

综上所述，实干型领导对乡镇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是一个“行为示范-心理建构-动机激发”的连贯过程。领导通过自身的实干行为树立榜样，明确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成功构建了一个充满信任与包容的心理安全空间。正是这个空间，让公职人员能够放下顾虑、主动作为，并将其对领导的认同和对角色的认知，真正内化为持久的公共服务热情。因此，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中，不应只关注领导者的业务能力，更应培养其塑造健康组织氛围的领导艺术。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